

中州钱币论文集



河南省钱币学会编

中州钱币论文集

主 编：谭忠善

责任编辑：杨 科

河南省钱币学会

中州钱币论文集

河南省钱币学会出版发行

郑州市星光印刷厂印刷

32开 160千字

1986年10月第1版

定价：1.50元

前 言

《中州钱币论文集》是从河南省钱币学会成立以来，四次钱币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的基础上选编的。这些论文大部分在全国和省级刊物上发表过，并有一定的影响。如赵会元同志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开展钱币研究工作》，戴志强、谢世平同志的《“货泉”初探》等文都在全国钱币学界引为注目；郝本性同志的《关于周代使用银币的探索》在日本泉界进行学术交流；杨育彬同志的《建国以来河南古代钱币的发现和研究所》具有地方色彩，一览我省钱币发现和研究之全貌，实为不可多得的文章；蔡运章同志的《秦国货币试探》亦提出了新颖的见解；汤文兴同志的《浅谈我国古代金属货币的成分及其铸造技术》深入浅出地从金属成分着手系统地论述了铸造技术；王学增、胡茂新同志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略》较全面地探索了苏区货币的发行、流通及地位与作用等等。此论文集既是河南省钱币学会部分成果的汇编，也愿为钱币学和货币史研究者提供可取的资料。

我们遵循“百家争鸣”的方针，文中保留了一些同过去的不同看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由于编者水平有限，学识浅陋，难免有错误之处，欢迎广大学者、专家批评赐教

编 者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

目 录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开展钱币研究工作·····	赵会元(1)
关于周代使用银币的探索·····	郝本性(10)
“货泉”初探	
——兼论莽钱制作特征的演变·····	戴志强 谢世平(22)
建国以来河南古代钱币的发现和研究的·····	杨育彬(46)
秦国货币试探	
——兼谈布帛是我国古代的实物货币·····	蔡运章(77)
“郢爰”释地问题及其它·····	董鹿生(94)
浅谈我国古代金属货币的成分及其铸造技术·····	汤文兴(103)
试论战国时期货币的统一趋势·····	赵宁夫(128)
对项梁“铸大钱”的新探·····	杨 科(143)
北宋铜钱金属成份试析·····	戴志强 王体鸿(150)
交子产生的原因及时间新探·····	刘 森(169)
从金属铸币的分离过程看纸币的产生·····	张晋军(182)
试论我国古代的皮币·····	梁晓景(189)
中国货币史上的光辉篇章	
——记中州钞发行始末·····	赵会元(198)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略·····	王学增 胡茂新(223)

目 录

-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开展钱币研究工作……………赵会元
关于周代使用银币的探索……………郝本性
 “货泉”初探
 ——兼论莽钱制作特征的演变……………戴志强 谢世平
建国以来河南古代钱币的发现和研究的……………杨育彬
秦国货币试探
 ——兼谈布帛是我国古代的实物货币……………蔡运章
“酈爰”释地问题及其它……………董虎生
浅谈我国古代金属货币的成分及其铸造技术……………汤文兴
试论战国时期货币的统一趋势……………赵宁夫
对项梁“铸大钱”的新探……………杨 科
北宋铜钱金属成份试析……………戴志强 王体鸿
交子产生的原因及时间新探……………刘 森
从金属铸币的分离过程看纸币的产生……………张鲁军
试论我国古代的皮币……………梁晓景
中国货币史上的光荣篇章
 ——记中州钞发行始末……………赵会元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略……………王学增 胡茂新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

开展钱币研究工作

赵会元

具有中华民族独特风格的中国钱币，历史悠久，绚丽多彩，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记载了我国商品经济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反映了历代财政经济状况，也体现了劳动人民聪明智慧和创造才能。它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是一门“小中见大”的不可忽视的学问。前人已经对它作过大量的研究，并留下了不少宝贵资料。今天，我们研究钱币的任务，就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继续前进，把钱币学的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阶段，使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这里仅就研究钱币学的着眼点、指导思想和重要意义等问题，略抒己见，求教于同志们。

—

钱币学从本来的意义讲，是以退出流通界的货币实物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科学。对钱币本身的形制、轻重、大小、色泽、成份、文字、真伪以及铸造年代、制作技术等进行系统地研究，是钱币学的基本内容。钱币学和其他学科一样，也会有发展，但无论如何发展，研究钱币实物本身，总是一个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钱币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钱币学同许多学科有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如金石考古学、古文字学、经济学、舆地学以及货币经济史、金属冶炼史、衡制史等等，与之有关的这些学科知识造诣越深，越可能在钱币研究中有所突破。没有这些有关学科的基本知识，钱币学的研究就无从下手，勉强从事，也难以有大的进展。因而钱币学就同这些有关学科发生了紧密的联系。

但是，不能把上述种种研究钱币学所需要的知识，统统叫做钱币学。比如货币史与钱币学的关系最为密切，可以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相辅相成的作用，因此往往被混为一谈。有人认为钱币学应当包括货币史，有人主张货币史包括钱币学。其实，钱币学和货币史各有自己研究的对象。钱币学以研究货币实物为内容，如上所述。货币史则要通过历代货币制度、货币理论、货币政策、货币购买力等的研究，探索货币历史发展的规律。货币史和钱币学不能混同，同钢铁工业和机械工业不能混同一样。钢铁工业离开了机械工业就无用武之地，机械工业离开钢铁工业就成为无米之炊。它们之关系虽然如此密切，但不能说钢铁工业就是机械工业，或者翻过来，说机械工业就是钢铁工业。有的同志把钱币学叫做“边缘科学”，如果是指它和其他学科有紧密的联系，那是可以的，但不应把钱币学和与它有关的学科混成一个东西。

对钱币实物的研究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前人没有解决的问题，需要我们去研究解决，前人已经有了定论的某些问题，随着新的钱币资料的发现，需要进一步研究。不断出土的丰富的钱币实物，不断给研究者提出新的研究课题。这就是说，我们需要许多专门家，从事这方面的专题研究，以取

得新的成就，把钱币学的基础打得更加坚实。同时，应该注意，钱币学的研究，必须跳出鉴赏古董的圈子，注意钱币学研究成果的社会运用。就是说要把钱币研究的目的同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挂起钩来，同其他学科，特别是同货币史研究结合起来，从对历史钱币实物和其演变发展的研究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服务。这应该是我们研究钱币的主要着眼点。

二

研究钱币学应该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点说它的唯物的、辩证的、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对于各个学科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钱币学自然也不例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货币理论对钱币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货币的起源和发展，是同生产和交换水平相适应的。根据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的论述，古代货币起源和发展的序列大致可以分为：物物交换时期，实物货币时期，金属称量货币时期，金属铸造货币时期。物物交换与交换的原始性、偶然性相适应，那还是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事。交换中尽管处于等价形式的产品起等价物的作用，但交换一结束，这种作用顿时消失，所以还不能说是货币。实物货币是在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即牧业与农业分离后产生的。这时“牲畜获得了货币的职能，在这个阶段上就已经当货币用了。”这个时期，父系社会代替了母系社会。金属称量的货币是在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即手工业分离出来之后产生的。因为这时“出现了直接

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贵金属开始成为占优势的和普遍性的货币商品，但是还不是铸造的货币，只是简单的按重量交换罢了。”^①这个时期阶级已经产生。金属铸币是在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即商业产生之后出现的，此时奴隶制已经完全确立了。总之，这一切都说明钱币的产生、演变、发展，是伴随着社会经济变化，生产水平发展而进行的，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这是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基本点。中国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不过是父系社会中的部落酋长和部落联盟的首领，就其社会发展阶段和生产方式来说，实行金属称量货币还不大可能，更不会有金属铸币。可是中国古代的钱币学家，离开社会生产水平和发展阶段的背景，硬把春秋战国时期的刀币、布币说成是三皇五帝的货币，上推了上千年。这种错误的断代，陈陈相因，代代相传，直到十九世纪初山东人初尚龄写《吉金所见录》，才把刀、布断归春秋战国，打破了旧日对三皇五帝的附会。这个问题对于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是比较容易解决的，可是钱币学的先辈，由于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解决这个问题竟用了六、七百年的漫长岁月。马克思主义对钱币研究的重要性于此可见。

中国钱币学源远流长。南朝萧梁时期顾烜的《钱谱》标志着中国钱币学的产生。从那时算起，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之后，历代钱币学家和钱币著作，绵亘不断，到清代乾隆时期，钱币学空前兴盛，再后钱币学的研究也有新的进展。历代钱币学家的努力，为中国钱币学打好了很好的基础。我们对先辈的成就应该充分肯定和尊重，但是也应该看到，旧的钱币学术研究，由于没有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他们

研究的范围、方法和结论，不可能不带有历史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有的是以赏玩为目的，把钱币作为应酬手段；有的是就钱币论钱币，脱离社会实际；有的只是注重文化方面，而忽视经济方面。我们既不能苛求古人，也不能不看到他们的缺陷。

解放以来，由于钱币研究工作者注意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用马列主义指导研究工作，取得了不少新的成果。一批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的货币史和钱币学专著，对我们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有很大帮助。经验证明，我们要开创钱币研究的新局面，就必须继续坚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用马列主义来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

马克思研究货币问题，总是把它放在社会经济的整体中进行研究的。我们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着眼于经济来研究钱币。钱币产生于商品经济，钱币研究成果再运用于经济，这是很自然的，顺理成章的。钱币学的研究如果和经济脱节，不为现实服务，就会使钱币学萎缩，就会成为一门对社会意义不大的学科。因此，研究货币必须同当时的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联系起来，分析钱币的演变发展和它对财政经济的影响，从中找出规律，总结经验教训，以资我们借鉴。现在已有不少钱币学家注意了钱币研究对经济方面的作用，这是钱币学术研究的重大发展，我们应该努力使钱币学术研究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把钱币研究的成果运用于当前经济建设。

马克思主义对事物的研究，是注重实际意义的。我们对钱币的研究也应如此。过去，经营古钱的商人，以古钱为商品，对它的价值估量，基本上遵循“物以稀为贵”的原

则，凡稀少罕见者视为“大珍”，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可以获得高价。但从钱币的历史价值来考察，这样估量古币的价值未必都是合理的。“秦半两”由于传世较多，在商人眼里并不那么主贵，从中国货币发展史的角度来评价，它却是中国货币走向统一的历史见证，具有划时代的价值。南唐李昇所铸“大齐通宝”，传世只有“缺角大齐”和“四眼大齐”两枚，而且已经下落不明，这真是奇而又奇，珍而又珍了，但从钱币的历史价值来考察，则远在“秦半两”之下。尽管有种种理由珍视稀少罕见的钱币，但绝不能因此而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目前数量还较多的钱币的研究有所忽视，否则，就失掉了我们研究钱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观察事物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对钱币的研究也应如此。钱币爱好者喜欢制作规整、精美的钱币，这是可以理解的。规整精美的钱币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作为一种艺术品而欣赏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深入探求，则精美的钱币所记录的未必都是人民的喜悦。在很多情况下，精美的钱币后面掩盖着社会财政、经济的危机和人民的苦难，历来被称为“钱绝”的新莽钱币，就是如此。因此，对历代钱币的研究必须全面考察，注意本质的东西。

三

钱币学这门古老的学问，当它得到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时候，便得到了新的活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钱币的研究空前活跃起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机关干部，男、女、老、少都有不少钱币的爱好者和研究者，显现出方兴未艾的势头。这同旧社会那种局限于有闲有钱的一小部分

人进行鉴赏和研究的局面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这种情况下，讨论一下研究钱币学的意义是很有必要的。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历代都很重视历史的研究。封建社会的政治家还知道写一部《资治通鉴》，“资”封建统治阶级之“治”，我们为什么不用历史来“资”社会主义之“治”呢？“鉴”是镜子，照照历史的镜子对于今天是有大益处的。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历史的研究，写了不少历史著作。马克思主义正是吸收历史的精华加以科学的创造发展而形成的。毛泽东同志特别重视历史，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批评了不重视历史的同志，说他们“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毛主席对历史懂得很多，他总结历史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中国历代钱币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历代钱币和现实的关系，同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一样，今天的货币是由古钱币（历史货币）发展而来的，要深刻认识今天，就要懂得昨天和前天，要认识今天的货币，就应该懂得昨天和前天的货币，只要懂得历史对现实的意义，也就懂得了钱币对现实的意义。

中国的钱币可以从遥远的原始社会末期开始，不缺朝代地排列到现在，其时间之长，连贯性之强，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中国是世界上使用银币和金属铸币最早的国家。反映在钱币制作上的鑿金技术、错金技术、叠铸技术，都是当时最先进的技术，直至今日，有些技术仍然有借鉴的价值。中国钱币影响到日本、朝鲜及东南亚不少国家。我们勤劳勇敢的祖先，在世界的东方，创造出这样光辉灿烂的古代货币文化，

当然是令人自豪的。通过钱币进行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教育，从而激发民族的自信心，这种自豪感和自信心，潜移默化，会变成扫除民族自卑感的武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力量。

钱币是不少学科进行研究的歷史证据。在钱币上铸文字已有二千几百年的历史，古文字的演变过程，大体在货币文字上得到反映。正是由于这一点，不少古文字学家，在他们对甲骨和金文进行研究的时候，有不少是从货币文字中得到佐证的。体现在钱币铸造上的青铜铸造技术，是比较系统的，研究金属冶炼和铸造史，就很注重对钱币铸造技术的研究。考古工作者不仅把钱币作为研究的对象，而且也利用钱币为自己的研究服务。一座墓葬往往从中得到几枚古币便可确定墓葬的相对年代。研究古代度量衡，也往往借助钱币的直径和重量验证古代的度量衡。如此等等。这种可靠的实物证据，对于研究某些专门史学来说，过去、现在乃至将来都是需要的。

钱币对于研究货币史和经济史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不论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发展缓慢的原因，还是研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都不能离开货币经济发展的水平，都不应忽视对当时钱币的考察。

对于金融工作者来说，更有现实意义。银行是主管货币发行，调节货币流通的部门，货币流通有自己特殊的规律。马克思曾用公式的形式把货币流通的规律表述出来。用这个公式去解剖历史货币流通，就可以看到历史上有不自觉地符合规律的时候，也有更多的违背规律的时候。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些“名目论”者，认为货币的需要量是由统治者的意

志决定的，统治者想发多少就发多少，最后引起通货膨胀。货币贬值。马克思的公式是：货币流通量要与商品流通对货币的需要量相适应，少则影响生产，多则引起通货膨胀。我们通过对历史货币研究，找出它的经验教训，对于研究今天的经济建设和掌握货币流通，不会没有参考价值。

从上述种种，可看出我们开展钱币学研究的主要意义。

目前，钱币研究的队伍已经初步形成。在这个队伍中有接触实物较多、长于考证的考古文博部门的同志，有以经济货币理论见长的教育科研部门的同志，有对货币流通感觉锐敏的金融部门的同志，还有广大的分布于各个部门、从事各种工作的钱币爱好者。这些同志各有所长，因而对钱币的研究也会各有侧重。不论从什么角度进行研究，只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加强协作，一定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注：①本节引文均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九节。

作者工作单位：河南省钱币学会

关于周代使用银币的探索

郝本性

银币在我国出现于何时，是中国货币史上十分重要的一个问题。前人对这个问题，主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以司马迁为代表，他认为远在虞、夏时代，中国已有银币，一直到秦才变成装饰品和宝藏的财物，不再作货币。在《史记·平准书》中，写到“虞夏之币，金为三品，或黄、或白、或赤、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贝。及至秦，一中国之币（原文为‘中一国之币’），为二（原文误为三，今改正）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司马迁所说秦代实行黄金与半两铜钱的二种币制是确实存在的。他所说的刀布之币也见于周代货币，所谓金三品中的黄金和赤金（主要指铜），确曾是货币，而白金，主要指银，也应该做过货币。

中外研究货币史的学者，对于司马迁这段话，或者笼统地相信，而不加分析研究，或者不相信其白金为币之说，以中国货币史学家彭信威教授为代表的学者们便属于持否定态度者，他认为白银“虽然自古即为金三品之一，但从来没有用作货币过”①日本著名学者加藤繁也认为秦有三种金属货币并非事实。②日本学者吉田虎雄说“银货币的使用，起始于汉武帝的时候，在这时代之前，并未通行过的。”在没有见到先秦的银币实物的情况下，他们持严谨慎重的态度是可以理解的。1974年8月河南省扶沟县古城村出土了窖藏的铲状币

18块，同出的还有“郢爰”、“陈爰”、“郢爰”等金钣195块、金饼197块。其中有完整的马蹄金2块③。笔者曾参加河南省扶沟县古城村这批货币的整理工作，并且把这18块银布币加以排比研究，在简报中指出：“空首银布币时代，至迟为春秋中期，短型实首银布币稍晚于空首银布币，可能为春秋晚期的货币。中型与长型银布币的时代可能为战国初期。”即把这些银布币全定为东周时期④。由此便想就周代使用银币的历史做一探索，以期引起关于中国货币史的同志们对此问题加以重视。

一、从文献记载的银与白金，看我国银的使用时代

银字屡见于先秦文献，下面列举五例：

（一）《禹贡》记载梁州贡品有银；（二）《周礼·职方氏》记载荆州“其利丹银齿革。”；（三）《山海经》中《山经》提到出银的地方十三处；（四）《韩非子·解老》所谓“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五）《管子·地数篇》：“上有铅者，其下有银；一曰：‘上有铅者，其下有钹银。’”上述诸例，仅《管子·地数篇》的著作时代有战国与汉代二说之争，其他诸例均可以确定为先秦文献，除《韩非子》为战国晚期著作外，《禹贡》、《周礼》和《山经》在战国早期已写成。因此银在战国时代早已被认识，并且被重视。上文所谓“银黄”，便指金银错工艺，在战国时期便是很流行的工艺。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出土的铁带钩，有三件上饰有金银错，记载比带钩的遣策，二〇七号竹简文为“一索（素）缣带，又（有）钹钩，黄金与白金之虞。”很明显，这里的白金指银。湖北江陵适